

新政治论丛

政治生态论

——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

ZhengZhiShengTaiLun

▲ 刘京希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新政治论丛

政治生态论

——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

刘京希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生态论/刘京希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607-3294-7

I . 政…

II . 刘…

III . ①政治理论②生态学

IV . ①D0②Q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1617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山大图书有限公司经销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1.50 印张 288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5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山东山大图书有限公司负责调换

**山东大学“社会科学青年成长基金”、山东大学出版基金、山东
大学“985 工程”学科建设基金资助项目**

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呼唤新的政治理念

——“新政治论丛”总序

政治实践的发展，政治科学的发展，必须不断地对既往的发展历程进行检视，以便在既有基础上更好地走向未来。尤其是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经济实践、社会实践、文化实践不断突破原有的思想认识和观念，当然也在不断突破既有的政治体制之框架，呼唤着新的政治理念和全新的政治运行模式。

当代中国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恰恰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同时，这也预示着对政治发展的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的历史契机。既有充分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又有相应的社会观念前提。有鉴于此，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中国下一步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新的部署。而且，这一部署有着宽广的新视野：首先，把公民的人权和自由权利纳入政治建设内容之中，民主建设重在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其次，进一步突出立法机

关的作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再次，更富有意义的是，强调宪法和法律的无上权威，很好地解决了执政党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问题，这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要前提。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再次，进一步明确了执政党与国家机关的法律关系，以使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具有合法性。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最后，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上述关于政治建设一系列内容的阐述，既富有新意，又有着广阔的视野，拓展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建设的领域，这不仅对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政治学界的学术研究也会是个极大的鼓舞。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发展必须以创新为前提，没有创新就谈不上改革，更谈不上发展；同样，学术研究也要有新突破、新视野，也要借鉴新方法，没有新突破、新视野、新方法，不能形成新的理论学术成果，就不能很好地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学术准备，无助于政治发展，学术研究的社会意义也就丧失殆尽。

以学术创新为指针，探讨政治发展问题，其创新无非来自两

个方面：一是学术视角、学术方法的创新；二是学术观点、理论体系的创新。

就学术视角、学术方法的创新而言，同一个重大学术问题，之所以被人们反复研究，这种关注与研究的历史甚至以千载计，多少人为之穷经皓首，原因既在于问题的难以破解，更在于在不同的地域和时代条件下，人们不断从新的视角、以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重新审视，以求得新的答案。比如说对民主的认识，早在公元前15世纪，希腊人就开始使用民主这个词来表述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概念，以及这种概念在希腊城邦中的实践。从那时到今天，3500年来，关于民主的探讨和争论未曾停歇，即便如此，由于人们视角与立场的不同，关于民主的一些基本问题迄无定论，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能形成定论。这些引起争论的基本问题有：“（1）由谁统治？这是一个人性竞争理论和公民身份的函数。（2）在什么限度和范围内统治？这涉及到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极权统治）以及民主统治的适当范围的问题。（3）以何种目的为名？这表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或者更为一般地来讲，表现了自由（个人权利）和平等（社会正义）的对立。（4）采取直接还是间接手段？就是说采取直接的人民统治，还是通过代议制？这对‘精英——民众’关系理论产生什么影响？（5）在何种条件和约束下统治？这其中包含了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问题；这一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社会阶级结构。”^①此外，还有一些有关民主的重大问题，也未取得共识，如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问题；民主政治的进入路径问题；

^① [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等等，仍然有着很大的歧见。具体到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如何认识西方民主？以怎样的态度借鉴西方民主？怎样才能更好地把优秀的民主理念与民主制度融入现实国情？都是难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答案显然是不一样的。在有着自由主义传统的西方人看来，西式民主是最好的，是民主的典范，因为它为个人发展预留了足够的自由空间和条件；但在有着集体主义传统的东方人看来，西式民主便太过自由散漫了，太计较于个人权利了，以至于冲淡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合作精神，把这种民主理论照搬于中国文化的土壤，难免会“水土不服”。即使是在当代西方，偏重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民主观，也正受到强调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合作精神的社群主义者的批评，以求为西式民主“纠偏”。有鉴于此，需要我们立足于中国国情，以中国文化传统的视角来观照民主及其诸种模式，从而创新我们的民主理论。

再比如说对社会发展的看法，角度不同，理解上就会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是南辕而北辙。以经济统计数字为依据看发展，以自由为依据看发展，以人文内涵为依据看发展，结论会迥然有别。以经济统计数字看发展，社会发展就是产值、利润、收入，就是林立的高楼和街道上壅塞的汽车，环境的代价，贫富的悬殊，不在考虑之列；以自由为依据看发展，社会发展主要就表现为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的增加。“经济发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长，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

就是自由。”^① 此时，产值、利润、财富便失去了大部分意义；以人文内涵的综合标准看发展，社会发展是优美的环境，是人的实质自由，是民主权利的普及，是社会的和谐与温馨的氛围。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源、畅顺的交通固不必论，高度的民主、健全的法治、适度的自由、高尚的情操、温馨的氛围、创造的冲动、求真的精神、互助的友爱等等才是人类生活更重要的追求，甚至是最本质和全面的追求。对同一理论问题的认识，换一个视角，就会别有洞天。报载，世界银行于 2001 年拟定了最近 20 年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百强地区排行榜，结果，中国的 20 个地区包揽了前 20 位。^② 这是以经济发展速度为标准得出的结论。如果以综合性的人文内涵为标准进行排行，结果可能会大异其趣。按后者的标准，数字式的国民收入不仅无法衡量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宽松的社会人文环境等等这些最宝贵的财富，而且会误导人们对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正确策略的理解。阿马迪亚·森用翔实的数据说明：美国许多社区人均收入比某些发展中国家高出几倍乃至几十倍，但生活质量（包括安全感、社区友情、种族平等，等等）却反而低很多。其他国家当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切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每个人生活得幸福，或者如马克思所说：是要达到人的全面发展。金钱或美元数字的国民收入或许是达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手段，但绝对不是唯一手段。^③

对于理论创新而言，视角和方法的创新，固然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学术观点与理论体系的创新，比起视角与方法的创新，

① [印度]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译者序言。

② 参见 2002 年 11 月 1 日《参考消息》。

③ 《中国究竟有多富?》，载 2002 年 11 月 22 日《证券时报·财经周刊》。

其创新难度无疑更大，相应的，其创新的社会意义也更大。既有的学术观点与理论体系，往往在无形中被人们尊奉为“正统”，定于一尊，不能或不敢轻易撼动与冒犯，这无疑是学术观点与理论体系创新的难点所在。比如说，“政治文明”这一新观点的创建，从学术界最初提出到为人们所广泛认同，既是一个长期的观念转变与适应的过程，又是一个新观点不断充实与完善的过程。在笔者的印象中，“政治文明”的最初提出，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的事情，经历了十余年的“厚积”，到新世纪初年，才得以“薄发”，为人们所认同，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超前性使然，也是政治发展新阶段的需要的结果；另一方面，“政治文明”新观点要立得住脚，经得起理论推敲，需要进行一系列理论阐述和理论说服，像政治文明的内涵、它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与核心等等，都必须予以界定与说明，这也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尤其是一直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理论宣传界，认同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突然在两个文明之间楔入“政治文明”，要真正承认这种创新，需要打破旧的思想框框，这更不可能企望一个早上就能完成。而一旦这种学术观点或理论体系的创新价值为人们所认识，进而引入并指导社会实践，它所释放出的“生产力”能量将是巨大的。当下，与对政治文明研究的过程相似，对“制度文明”问题的研究，正在不断走向深入，只是，“制度文明”研究的创新成果还“养在深闺人未识”，它的实践价值还有待人们去发掘，在讲求规则与法度的全球化时代，“制度文明”所具有的创新价值一旦为人们所认知，并被引入社会实践，同政治文明建设一样，他将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生产力”能量。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作为这一时代变革的重要方面，政治发展正在向“新政治”转型，人们的政治理

理念也正在经历新的蜕变。理念的变革是其他变革的先导，作为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与现实关怀的政治学人，不能满足于仅仅充当社会变革的看客，而应积极投身于这一社会历史进程，用我们思想智慧的清流，浇灌社会变革之树。本丛书的主旨，即在于或者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或者以新的观点和新的体系，对政治发展中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检视，力图作出新的诠释，以期助益于政治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该丛书得以面世，得益于山东省政治学研究会、山东大学出版社的襄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编者谨识

2006年10月10日

自序

环境生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形成研究热点，始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随着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传统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日益边缘化。同时，新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地位的日益加强，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尖锐对立和矛盾：人类日益从与自然相谐而生的共荣关系中分化出来，异化为自然的对立物；对自然环境的颐指气使和肆意破坏，显现出人类的无知和自傲；自然环境及其生态体系自组织结构在不同层次上被人类所阻断……进而，人类自身也由这种短视和功利行为的受益者，逐渐沦为受害者，而遭受到自然环境的严厉惩罚和报复。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促使人类进行自我反省。在此背景下，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 1962 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对人类自掘坟墓的无知行为的反思为标志，人类进入了“生态学时代”。20 世纪 70 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生态关怀，促成了《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的诞生，生态意识开始引起各国政府甚至联合国的注目。20 世纪 80 年代，绿色生态运动及其研究，开始更密切地加强与政治的联系，不仅研究机构、学界、媒体介入生态话题，而且，在发达国家，政党组织更打出“绿色”旗帜，绿党应运而生。进入 21 世纪，由于生态危机的全球性蔓延，生态理论研究的重点将是全球

化背景下的生态重建。

在国内，对环境生态理论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其研究特点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分析，学理意味浓厚，而现实参与意味淡薄。这其中，以周穗明的《智力圈》、余正荣的《生态智慧论》和郇庆治的《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为代表，以比较东西方思想界由古至今的生态思想的演变及其特点为重点，力图探求一种合目的性的生态思想。总的看，在我国，对生态理论的研究，以总结前人的思想成果为主，因而尚处于初始阶段。

将生态学的观点与方法运用于对社会政治现象的研究，始于美国哈佛大学的 J. 高斯，而对这一理论作出重要发展的，是 F. W. 雷格斯。雷格斯的代表作《行政生态学》出版于 1961 年。该书分析、研究了美国、泰国、菲律宾等国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文化历史与公共行政的相互影响，认为了解行政行为必须超出行政系统本身，由社会背景入手，探寻行政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行政生态理论的研究，在于揭示行政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探讨行政系统如何应对环境挑战，适应外部环境等问题。行政生态理论的具体内容包括：其一，行政系统的自然生态分析。分析一个国家自然地理环境对该国行政系统的影响，提出应采取的行政对策。其二，行政系统的社会生态分析。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环境因素对行政系统的影响及应采取的行政对策。比如研究政党、压力集团与行政过程，经济发展与行政功能，人口压力对行政的挑战，科技进步对行政的冲击，政治文化对行政模式的影响，社会风尚与行政改革，价值观念与行政发展等。其三，行政系统的心理生态研究。这是行政学心理分析的自然延续，注重分析社会心理、团体心理、公务人员

个体心理对行政的影响。^①

受西方行政生态理论的影响和启发，把西方生态学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中国政治学者，当属王沪宁、王邦佐等先生。王沪宁所著《行政生态分析》，早在1989年即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或许是国内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政治生态学著作。对于行政生态学，该书认为，它指的是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社会圈的相互关系，即通过生态系统的模拟来研究行政生态系统。^②而由王邦佐、李惠康共同主编的《西方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以及由王邦佐等编著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可以说是运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政治学专题研究的新的尝试。正如后书序言所称：“将中国政党制度置于广阔而复杂的社会诸环境系统，通过分析中国政党制度与社会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探索并把握这一政党制度产生、变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式与深层根源，不仅提供了分析的科学基础，而且拓宽了分析政党制度的理论视野。”^③因此说，这确是对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的有益尝试。

无论中外，对生态理论的研究的一大缺憾，是均少涉及政治体系与生态体系的关系，即使有所涉及，也仅限于探讨生态环境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而未能深入一步，实现生态学与政治学的对接，进而借鉴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政治体系的生态化运作。美国学者雷格斯与中国学者王沪宁、王邦佐等，开拓与展宽了政治学的生态分析思路，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手段与方法。但这种研究仍有其局限，即他们对政治学研究新方法的拓展，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的某个局部，或者是行政学方向，或者是政党

^① 参见张友渔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行政生态理论”辞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参见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③ 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制度专题。

在现时代，生态学的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早已远远超越了其学科本身，而具有了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普适性。笔者所涉政治生态理论，正是试图借鉴生态学原理，参照其方法论原则，探讨政治体系与其次体系的关系及其生态化重塑，政治体系内部诸次体系的关系及其生态化发展，以及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及其生态化演进，政治体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及其生态化推演，以在一般理论意义上，探寻一种普遍适用的政治理论模式和政治运作模式，谋求政治体系的生态化和民主化。这是试图确立一种新时代的政治观的理论尝试。

政治生态理论具有政治学和生态学的交叉学科的属性。在研究中，力图跳出传统政治学的理论视域，转而引入生态学概念和原理，以丰富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思路是从生态学的视角去观照政治现象及其环境关系，揭示政治现象的内在本质，对政治生活的实质作出新的解释。

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出新，借鉴生态学之生态、生态平衡、生态群落、生态多样性、生态互动、生态链环、生态圈、协同进化等概念及其内蕴的方法，用于政治理论研究，实现生态学与政治学的对接和融合。

在研究途径和思路上，将生态政治理论划分为三个层面，进行分层研究。这三个层面分别为：政治体系内生态，主要指政治体系与诸次体系的纵向生态与反生态关系，以及诸政治次体系间的横向生态与反生态关系；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间的生态与反生态关系；政治体系通过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间的生态与反生态关系。三个层面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通过逐层分析，在理论层面上寻求人们所向往的政治的生态化发展。

本项目研究的目的，是尝试通过对政治体系的生态学分析，实现政治学与生态学的对接与融合，为建立一门新兴学科——政治生态学——探索路径。

目 录

自序 (1)

上篇

第一章 新时代的政治

—— 政治生态理论界说	(3)
引子	(3)
第一节 政治生态：理论与方法	(7)
第二节 政治生态与绿色政治	(25)
第三节 政治生态理论的特性	(31)
第四节 生态化政治体系的三个层级	(37)

第二章 “和而不同”与“美美与共”

—— 政治生态理论的思想渊源	(4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生态思想意蕴	(41)
第二节 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政治生态追求	(49)

中篇

第三章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自然—社会”生态关系 (83)

 第一节 自然生态的价值准则 (84)

 第二节 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生态链属关系 (95)

第四章 “莲花效应”与师法自然

——社会体系及其生态法则 (103)

 第一节 社会体系的生态法则 (104)

 第二节 社会结构及其生态 (116)

 第三节 社会组织及其生态 (120)

第五章 政治“生态位”与体系协同进化

——政治生态体系的构建 (124)

 第一节 政治生态体系的构成及其生态法则 (124)

 第二节 政治体系内部的生态关系 (136)

 第三节 公共行政中的行政生态原则 (148)

第六章 “道并行而不悖”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生态诉求 (154)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生态变奏 (155)

 第二节 个人与国家：公民意识觉醒的政治生态价值
..... (168)

 第三节 政府与市场的生态联动 (179)

 第四节 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的政治生态判别 (189)

第七章 政治中心主义的自我超越

——一种政治生态文化机制 (201)

 第一节 政治中心主义：反生态的政治文化 (203)